



## 一人一故事劇場 在社會變革中的實踐 國際導師主題講座

時間：2014 年 12 月 5 日 19:00

地點：台南大學榮譽校區 A108 會議廳

講者：Ben Rivers

翻譯：蘇慶元

引言：李志強 (台灣一人一故事劇場協會常務理事)

紀錄：周舜裕

順稿：李志強

[志強介紹 Ben Rivers]-----

--

在三一八學運開始後的四月六日，有一群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工作者到立法院外為在場聲援的群眾演出。演出之後，參與的夥伴開始反思：此刻臺灣正在改變，身為劇場工作者，我們究竟能做些什麼？於是經過討論之後，我們決定邀請國際上長期接觸社會變革工作的一人一故事劇場工作者來臺灣分享，關於如何運用劇場來引發對話和促進社會變革，並思考戲劇工作者可以切入的角色。在詢問之後，許多老師一致推薦 Ben Rivers。Ben 是一位治療師，在澳洲長大的英國人，並曾在美國求學。2011 年開始在巴勒斯坦運用一人一故事劇場。這兩天有機會和 Ben 討論，他告訴我有時候我們太想要對話、連結，但是在此之前有很多事要處理。我相信 Ben 會帶來許多精彩的故事與運用戲劇工作的經驗，就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 Ben Rivers 一同向大家分享。

[Ben Rivers 先邀請演員自我介紹、演出]-----

Ben：請問有多少人知道一人一故事劇場、看過一人一故事劇場？我可以用描述的方式來介紹一人一故事劇場，但是假如我這麼做，你們可能還是不太理解。因此我想藉由新朋友的幫助，帶給大家一次一人一故事劇場的經驗。

演員自我介紹。

邀請各位想想今天過得如何，也許在場的某位觀眾，願意分享的，可以舉個手。

[觀眾分享]-----

我覺得活著真好！

前幾天，一個好朋友癌症末期過世，跟我年齡相仿，感覺到如果隔天可以平安醒來，或今天出門沒有任何意外，又或者上帝沒有給我們一個奇怪的驚喜，例如：癌症。所以我覺得活著的每一天都是值得精彩，因為人生如此短暫。

**Ben**：所以有時死亡，告訴我們要更珍惜我們的生命，請看。

演員演出：

活在當下此時此刻，我在這裡。

喔痛，真好。

新的一天真踏實...

**Ben**：是這樣的感覺嗎？還有嗎？

下一位觀眾分享：

今天一天都很忙碌，早上忙打掃，因為明天家裡要噴藥（登革熱），還沒做完就要趕著去學校上課，一整天都處在很忙碌的狀態，晚上又要趕著來這上課（大家笑）。

**Ben**：現在感覺怎麼樣？觀眾：**a little peace.**

**Ben**：是什麼帶給妳這種感覺？觀眾：剛進來的那些音樂。

**Ben**：從忙碌到平靜，請看。演員呈現。**Ben**：有這樣的感覺嗎？

這是非常短的示範，假如有更長的時間會更完整，但是已經可以看見一人一故事最基本的形式：有一位觀眾願意分享自己真實的生命經驗或故事，臺上演員會傾聽，把故事轉變成身體、聲音、語言，當下即興演出。

[進入演講]-----

在講在巴勒斯坦做一人一故事的應用之前，我要先講我的故事：我在蘇格蘭出生，但是我的媽媽是英格蘭人，我的爸爸是以色列人。因為我在以色列有家人，從小對那邊的政治情勢很有興趣。很多年過去我開始我的博士生涯，我現在還在為我的博士論文奮鬥，希望明年是最後一年（笑）。我的博士論文是在研究「和平跟衝突之間」。因為我自己是治療師，同時也是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實踐者，我在找尋有沒有這樣的地方讓我運用劇場面對衝突這件事。我的家族跟以色列有這樣的關係，所以我決定到巴勒斯坦。我的曾祖父是烏克蘭的猶太人，他從烏克蘭移居到歷史上的巴勒斯坦。他們算是歷史上第一批從歐洲移民到巴勒斯坦土地的以色列人（猶太人）。這大約是在二十世紀初期的事，他在以色列算是知名人物。那時他負責跟巴勒斯坦人買土地，然後把巴勒斯坦人趕走。他的兒子（我的祖父）是一個軍事科學家，他發明各種爆炸性武器來破壞這些巴勒斯坦的家庭，這不是很光榮的家族歷史。我的父親決定打破這個家族傳統，他離開了軍隊。在 1970 年代早期，那時在以色列，倘若沒有完全服完兵役，你的名字會被打上 X X。他離開以色列去蘇格蘭學藏傳佛教，跟佛教徒的媽媽相遇，共同創立了一個蘇格蘭佛教中心。我在佛教家庭出生，我有一個佛教名稱，這就是我的故事。

關於「自由劇場」：我在 2011 年去巴勒斯坦西岸--「自由劇場」。在難民營當中（現場沒有人聽過自由劇場）。

這是難民營所拍的照片：



1948 年，以色列有軍隊先把巴勒斯坦地區的原住民（原本住在那的阿拉伯人）趕出去。七十五萬人被趕出家園，五百多個巴勒斯坦村莊被摧毀。他們在附近國家（約旦、黎巴嫩、埃及等）的難民營待下來，有些人在西岸。聯合國為此建立了 59 個難民營，他們成為世界最大的難民營，共有 1,200 萬人，比臺灣一半的人還多。我住在難民營中，其中有一個自由劇場，它很特別，而且世界知名，因為巴勒斯坦人以藝術為媒介，對抗以色列人。

難民營中的年輕人用各種戲劇、影片、電影等來喚醒世界上許多人對他們處境的關注。在 2011 年 4 月，自由劇場領導人（Juliano）被暗殺，沒有人知道誰殺了她。有一個戴著面罩的人，騎機車到劇場前，在她胸腔上開了五槍。幾年過去了，我們還是不知道誰是這起暗殺的主謀。Juliano 她媽媽是以色列猶太人，爸爸是巴勒斯坦基督徒，可能是她的背景，以色列人不喜歡這個人，認為她在抵抗她的祖國。他們決定接管這個謀殺案的調查，他們派了軍隊，幾乎每天過去難民營，逮捕、折磨、調查。他們說：「我們在調查謀殺案啊」。包含逮捕的浪潮，自由劇場的成員們，我們決定必需要有一個文化上的回應，我們決定用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形式，所以我們在難民營的街上用一人一故事劇場演出作為開始，我們去邀請那些被逮捕的、被折磨的人們來到劇場中分享他們的故事。第一場演出，人們來分享士兵如何逮捕、折磨之後又釋放他們。演出之後，他們分享：很開心故事可被聽見，以及他們的故事可被傳到國外（當時有記者來做採訪工作）。

當我們用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形式來做文化行動時，非常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跟這些有能力把故事傳遞出去的人保持良好關係，所以演出時我們邀請記者、攝影師、外交官、研究者等文化

行動者。我們非常注意我們的觀眾是誰，我們要很仔細的去思考：不只是故事需要被聽見，同樣重要的是這些故事必需被傳遞開來。分享故事的人們說：「我們覺得是被關心的、被呵護的。」這對他們而言非常具有意義，我們創造一個環境，讓他們的故事可以被說出來。

這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演員之一。



演出過後的當晚，軍隊闖進他的家，他家附近有五十位軍人，在三點二十分有軍人闖進他的臥室，就在他睡覺時，把他從床上拖出、扣上手銬、抓到大街遊街，到表演的這個地方，罩上眼罩、帶到監獄，整晚調查他身為藝術家，他做了什麼。他嚇壞了，也不過就是在幾個小時以前，他在那裡（表演空間）聆聽故事、表演，超現實的在幾個小時前所表演的地方。他非常害怕，他在想他待會兒會被折磨，但是另外一個層面，他也覺得自己已經準備好了，因為他聽了那麼多相關的故事。他幸運地沒有受到酷刑折磨，但對當局而言，這是非常清楚的訊息：「你們給我小心一點！我不喜歡你們用各種形式抵抗，無論是有武器的或是沒有武器的文化行動！」

[補充以巴的歷史背景知識]



1946 年的巴勒斯坦領域，深綠色是巴勒斯坦；白色是以色列。深色地方是原本巴勒斯坦所居住的土地，白色的地方就是我的曾祖父所買的土地呀。1947 年，聯合國做了一個決議，但是卻沒有經過巴勒斯坦原住民的同意（我們要把土地區分開來），有些土地屬於以色列的，有些屬於巴勒斯坦的，這是一個非常不公平的決議，因為兩個原因：第一、它並未經過巴勒斯坦人民同意，就像聯合國決議臺灣一半分給日本，另一半臺灣自己留著，你感覺怎樣？

觀眾：生氣；Ben：當然，這樣我們會準備來去抵抗嗎？

觀眾：Yes；Ben：當然，這很正常不是嗎？這是第一個不公平。

第二、他們會把巴勒斯坦最好的土地給以色列，巴勒斯坦留下來的是貧脊的土地。1967 年繼續戰爭，以色列人也佔領了約旦河西岸，還有 Gaza 走廊，根據國際法，這是非法的佔領。以色列人開始派人進去屯墾原先巴勒斯坦所居住的地方，這樣的殖民行動一直到現在都還在進行。假如我們去閱讀以巴的歷史，你會讀到一直有人把以色列人送進巴勒斯坦的土地上。根據國際法，一個被佔領的人，他們應該是被允許使用武力去做反抗。巴勒斯坦人想用武器防衛他們的家園，但以色列人有全世界第五大的軍事力量，而巴勒斯坦沒有軍隊，沒有海軍、陸軍，像哈瑪斯這個組織也只有很遜的火箭砲，所以他們不太能夠瞄準。我們嘗試過軍事防備，但結果不太好，所以很多人嘗試用非暴力方式來抵抗。也許你們都聽過，我在澳洲長大，我對巴勒斯坦的印象是他們有槍，我很好奇你們對於巴勒斯坦人的印象是什麼？你們有巴勒斯坦恐怖份子印象的請舉手？（現場許多人舉手）可見大眾媒體的傳播力量，他們選擇故事中的一個面向，但事實上巴勒斯坦有一個傳統是不要去使用武力、暴力。

巴勒斯坦學者（Thompson, Hughes and Balfour）所描寫：“representations of ‘reality’ are contested in places of war; sometimes as much as bodies and buildings”. 再現的地方是備受爭議的。他有寫過一本書《文明的抵抗》。他描述巴勒斯坦一百三十年以來，如何用比較文明的方式去對抗殖民主義，去對抗英國人或以色列人，自由劇場也是這樣傳統裡的其中一部份。而我們好像被國際媒體所制約了，看到這些巴勒斯坦人，很容易就覺得他們都是恐怖份子。在衝突的地方，身體等被控制、被破壞，不只是身體、財產，連他所敘述的這些都是被破壞的。所以藝術在這裡顯得相當重要，許多巴勒斯坦人對我們說，他們喜歡一人一故事劇場的一個理由，是他們注意到這些國際媒體，不太能真正的去代表他們，在一人一故事聲中即使是很平凡的人，都可以上臺，訴說他的真實故事，立刻看到再現的真實，沒有其它的干擾，這是非常真實、直接的表述。在第一場演出之後，我們開始在難民營周圍做其它的演出，這些人民有非常大的渴望去訴說他們的故事。

分享故事，畫面中的女性 UHM ZATI，正在分享她與兒子的故事：



凱斯正跟一群羊吃早餐，突然之間一個軍隊的吉普車從駐紮地開了過來屯墾區。一群軍人過來，把他上銬、矇上眼睛。我（UHM ZATI）在很遠的地方，但我仍可看到他把我兒子的衣服脫掉，我看到兒子完全赤裸的身體，而當時是冬天。我想知道發生什麼事，想到兒子那邊，士兵把我推開，他們把槍上膛，指著我。我（UHM ZATI）對他們大喊：「你們要對我兒子做什麼？他沒有做錯任何事！」但他們要開槍威脅我，我後退。他們仍然把凱斯抓住，

他們命令他往哪走，全程凱斯都在尖叫：「媽，走開、離開我！」他很不希望我在那樣的狀況下看到他。像這樣的故事，在告訴我們他們真實現實中的樣貌究竟如何。他們是農夫，他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開槍，但他們每天都在面對這些士兵用槍指著的威脅。

演出的一個場景，那時我們只有兩位演員：



10/22 的演出，那時以色列攻擊 Gaza 走廊，他們把道路封鎖，有一半的演員無法進來。這些觀眾中，有以色列的活動份子、英國導演、社群的農夫、周圍村莊的農夫，在觀眾當中有一個女人叫 **Luisa**，她是歐盟的前任副主席，她有非常多的政治聯繫。也有一群巴勒斯坦的大學生在觀眾席上，他們在學習媒體倡議，他們的工作是聆聽故事，並且將故事紀錄下來，然後把它轉換成小的短片，把演出的影片作為社會倡議之用。這就是我們夥伴們如何有策略性的應用這場演出。這些社群中我們都沒有足夠的水、食物，我們的夥伴他是一個專為巴勒斯坦人爭取水源的人，我們那時去了四個不同的社群，像這邊就有一群大學生一起參與。

如我所說，巴勒斯坦人非常熱切的期望人們可以真實的去聽到他們的故事，尤其是巴勒斯坦以外的人。為什麼他們要這些國際社群聆聽他們的故事呢？我已經說出一個理由了：媒體不能代表他們的聲音，還有呢？觀眾：「或許是政治、食物、水與外面的力量等。」

事實上，巴勒斯坦人不太有人道的協助，而是去尋求政治上的協助，因為美國政府一直給以色列經濟上的資源。每天，以色列人都會從美國那收到很多錢，這些錢比他們一天軍隊所需的開銷更多，猜猜看每天從美國那邊得到多少經濟援助？

答案是「每天八百萬美元，發展軍事力量，對抗巴勒斯坦！」歐洲同樣也給以色列支持（優惠的貿易）。巴勒斯坦人理解去對抗以色列的方式，用軍事的力量不是唯一方法！他們了解必需要停止美國、歐洲對以色列的支持，還有從印度來支持以色列，對抗巴勒斯坦的人，印度跟以色列有很強的軍事連結關係，我不知道臺灣跟以色列的關係？臺灣有嗎？

觀眾：臺灣有支持巴勒斯坦的紀念若雪巴勒斯坦資訊網。

觀眾：我們有些飛彈技術是從以色列來的，所以我們以前有和以色列合作。

巴勒斯坦人強調國際上的政治支持，來施加壓力給美國、歐洲國家等對於以色列的支持。就像 1980 年代，國際社會對於南非種族隔離制度的反對一樣。那時的國際社會給南非政府壓力，才始得種族隔離制度得以消失。就像我們不去買南非食物，不跟南非政府建立關係的方式。為了嘗試協助巴勒斯坦人跟國際社會建立關係，我們有一個想法，我們想做一個免費的自由搭乘，我們邀請世界各國的人到巴勒斯坦，我們用公共汽車，帶他們去西岸的土地，參觀巴勒斯坦的社群，聽他們的故事，用一人一故事場演出他們的故事。這也許是一種方式，讓這些人看到巴勒斯坦實際發生的事，然後可以重新去思考。

在 1941 年代的美國就有自由巴士的概念，我們是依照這種想法創造的。在 1950 年代末，有一個很有影響力的公民權力運動，專門針對黑人、白人議題發起的社會運動。那時美國南部的幾個州，接受了一個法律的條約，這些法律強制隔離有色人種跟白色的美國人。在公車上有白人的座位，不是白人的要坐到後面其它的座位；在餐廳、咖啡廳也一樣，有白人區、非白人區。有非常激進的學生、公民運動，他們決定到這些地方開公車，他們打破這樣的立法，讓白人跟黑人在公車上坐一起，他們到南方的一些州，做這個自由搭乘的活動。也有極端主義者轟炸掉汽車，許多警方也逮捕了這些自由搭乘的運動者。幾年後的 1964 年，在澳洲也有類似的活動；直到 1977 年，澳洲的原住民才有資格去投票。澳洲也有自由搭車這樣的傳統，用這樣的方式喚起大家的意識，非常的成功。在這樣的運動之後，美國聯邦政府決定取消種族隔離的制度，這場運動後，澳洲原住民也有投票權了。我們想遵循前人的腳步運用這些活動，我問很多巴勒斯坦西岸的人：「你要不要參加自由巴士」？所有西岸村莊的人都說：「好，我們都要參加。」在我們第一趟的自由搭乘後，隔年就變成四輛巴士，有很多不同的社群，很多不同的人，有一人一故事劇場表演者、現場音樂演奏者等，我做了很多組織的工作。重要的是在第一輛自由搭乘中有很多組織連結的過程，那時沒有人知道什麼是一人一故事劇場，我們就走到村莊裡做一人一故事劇場，讓他們知道。我們也在別人的客廳做演出，這是在主導公民反對運動的領袖家裡：



也跟遊牧民族一起工作，這是他們的居所，也是我們的劇場，到這我們就在帳篷裡演出。



藝術家、演員，休息一下，喝咖啡、彈音樂。晚上就睡在那兒。第二天早上，我們跟那邊的小朋友一起做工作坊。像流浪劇團，很開心的，那時都很像巴勒斯坦人。也有策略上重要的理由，我們了解到跟這些社群關係能夠越深的話，我們就能有更大的影響力。有些人做政治性的劇場，他們覺得很優越，他們很享受演出時有的沒有的東西，然後像搖滾巨星般的離開。我們跟我們的人民在一起，我們無法成為這樣的搖滾巨星，因為這些演員都是活動中的領導者，他們每天都在面對不同的壓力。我們的演員覺得這算是一種特權，可以有機會接近這些家庭，年復一年我們就可以住在他們家，跟他們比較靠近。我們的演員可以跟這些很棒的政治運動領導者產生一些關係，學習如何組織、連結。對於演員與社群都是很好的經驗。社區也開始去信任演員，他們知道，這些演員不只是城市來的明星，弄一弄就走掉了。所以我真的感興趣的是一種持續性的、長期的關係！

在自由搭車活動，很多活動都會在社區發生，一人一故事劇場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有社群的工作坊、一些課程、參與抗議，我們也跟公民不合作運動結合。演員會到不同社區跟他們住在一起，產生關係。在自由搭乘的活動裡，來自世界各國的人都一起來了。我們的第一趟行程有一些瘋狂，因為太多人了，很多事情同時發生，雖然我們有想跟社群建立關係的心願，但是突然之間我們好像一下子要做一千萬件事情：去了一個社區做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演出、喝茶、回到公車上、又到下一個社區、晚上的音樂演奏、第二天早上又去參觀其它的社區....（很多很多事）。

在此之後，我們就回到演出過的社區，去聽社區朋友的回饋，想知道他們給我們的意見是什麼。他們說：很好啊、不錯啊，這些世界各國的人可以來聽我們的故事，但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我們很好奇：世界各地不同的角色（不同國家的卡車司機、農夫、家庭主婦），有什麼異同的感覺？我們彼此感到好奇，所以，這九十分鐘的演出，對我們感覺還好。下一次，你們應該可以待個四、五天。

這對我們而言是非常激進的點子，大部份對於表演都是一兩個小時，他們認為要四、五天才夠，他們說：「在這四、五天工作中，你要跟我們一起工作、做麵包、洗盤子，當軍隊來的時候，你們要一起跟我們站在軍隊前面，然後也可以做你們的一人一故事劇場。然後，當你們做一人一故事劇場時，這些人會比較知道我們到底在講些什麼。當我們在說家園被摧毀的時候、小孩被以色列人丟石頭時，你們就會知道，因為你們實際上看到了。」待在社群當中，對我們而言是非常巨大的影響。對於演員而言，我們真正知道這些人的真實生活的樣貌，也比較能夠代表他們做演出。當有人說到一些地理位置時，演員知道他在說哪裡！對於大家而言，這才是真的 **long stay**，才是真的有幫助！

在這些社區裡，沒有居住屋，只能待在帳篷裡。他們那邊（以色列屯墾區）有電力、水，現代化的社區。但屯墾區旁邊，沒有電力、水源的供給，他們住在帳篷裡，放羊。當我們把世界各地的人帶來真的住在這樣的環境當中，他們實際用眼睛看到這樣的環境、種族隔離等情境。當他們有更真實的經驗，他們就會有更多的動力，當他們回到自己的國家時，可能就更具有動力去行動。我們為社區的孩子、年輕人做工作坊。但是今年三月最後一次自由搭乘活動

中，我們也做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工作坊，一半參與者都是巴勒斯坦年輕人，另一半是來自世界各國的人，工作坊維持好幾天，用這種方式去建立較深層的關係。一人一故事劇場這種形式，很大一部份是在做社區營造的工作。Jonathan Fox，他是一人一故事的創始人，1975年就有這樣的想法：假如把大家帶到這裡，做一人一故事劇場，可以增加社群彼此的連結。我有一點同意，也有一點不同意。假如我們只有九十分鐘的演出，我們能做的只有一些些，我們真的有辦法在九十分鐘內跟他們建立深層的關係嗎？不可能！我們應該嚴格來檢視這個想法，去想還有什麼方式可以建立更真實、長期的關係？在我的經驗裡，用工作坊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建立非常強烈的關係，假如每天有六個小時在一起，許多天後你可以想像，我們可能比兩、三年的朋友分享了更多的事。

在一人一故事劇場中的缺點：想像巴勒斯坦的農夫在舞台上。他們告訴我們他們被屯墾區的以色列人攻擊，我們都很有同理心、慈悲心，我們心胸敞開、我們同情、同理他們。我不是說這不好，這非常好，但是我們並不能從他的故事裡看到更大的框架，例如在歷史上我們並不知道以色列人已經殖民他們六十五年，我們不知道美國給他們（以色列）每天八百萬美元，這個巴勒斯坦農夫的受苦，是因為這些國際上許多遊戲在進行著，但一人一故事劇場是個人的故事，不是社會的。我們不期待巴勒斯坦放羊人能去跟大家說歷史等，但是假如我們期望我們的觀眾在聆聽完之後，可以去採取更多的政治行動時，我們就應該要給他們更多的背景故事，所以我們開始有不同的活動（學術研討會、自由搭乘等），讓更多藝術家等能講述巴勒斯坦的事情。身為藝術家有時要有更多的連結，我們並不能獨自的抗爭，我們是運動的一部份而已，要找到夥伴，去貢獻我們可以貢獻的！

在約旦河西岸，以色列人並不允許巴勒斯坦人建造房屋，因此他們必須要「非法」的建造房屋。他們知道通常到後面，以色列軍人會進來摧毀房子，所以在自由搭乘活動中，我們也協助他們做泥磚、建學校。我們都知道這些房子有很大的機率會被摧毀，但是我們把它塑造成是公民不服從的運動之一，世界各地的人們可以對此事件有更高的覺察。我們也參與抗議活動，我們與巴勒斯坦非暴力的公民組織一起合作，一起組織遊行抗議活動等。本來以色列軍人想要把五個巴勒斯坦村莊拿走，他們就可以把這邊當作軍事訓練中心。



當我們走了 20 分鐘，軍隊出現了，他們帶走自由搭乘的其中一個成員（中間灰色帽子的人）。他是 rap 饒舌歌手，他是紐約和平詩人組織的成員，他們要把他遣返回美國，十年不准再進入巴勒斯坦，但他什麼都沒做。另一方面來說，對於他而言是非常可怕的事，他不能回來了；另一部份，以色列人在做這些事，會拿石頭砸自己的腳。這樣的行動，同時也會讓我們更加看到不公義的事情，連一個詩人都不允許，連一個詩人都要迫害。這樣的一個事件，在很多媒體都出現報導，他們都很支持我們這樣的運動，我們都很感謝他被遣返，這是非常高貴的自我犧牲。

還有由小朋友組織的抗議活動。有更多故事，但沒有更多時間跟大家分享。包含一人一故事劇場的演出，之後被軍人中斷了。但是又再一次地讓我們可以看到，這些公權力的壓制，也在協助我們做這樣的政治運動，連這樣的活動他們也要阻止。

我已經講了 1 個小時又 40 分鐘，接下來是 2 分鐘的休息時間。

[下半場演講]-----

身為一人一故事劇場的實踐者，以及一個劇場實作者而言，很重要的是去檢視社會改變的理論。當我們用劇場嘗試帶來政治、社會上的改變時，到底戲劇會如何帶來什麼樣不同的改變？在一人一故事劇場的社群中，一般的理論中，當我們把不同觀點的群眾一起帶來劇場時，不管這兩個族群是不是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立場上的衝突，一人一故事劇場將會成為一種

橋樑，讓這些族群彼此了解、溝通。當他聽了我的故事，他將會把我當成一個「人」來看待，所有刻板印象、偏見將會消失。因為藉由說故事演出的方式，故事中的人性讓我們都彼此連結，這改變了某一些理論。

**Gordon Allport** 所定義的理論：在群體之間的接觸，將會減少產生刻板印象的可能。在專門營造和平、避免衝突的團體中，在過去幾十年來，往往對這樣的理論有諸多批評，為什麼？

觀眾：他們期待雙方在理性中工作。

觀眾：文化上的交流，去了解一下，碰一下就沒了，像文化的旅遊。

有時候敵意過強，我們無法讓雙方處在同一個空間。例如在屯墾區，有些人他們確信，上帝給他們權力在這塊土地上（指猶太人）：我是被選擇的人，神選擇了我們，這些巴勒斯坦人是骯髒的小老鼠，為何我要加入這個連結當中，反正上帝都不要這些人了。在這樣的狀況，理論並無法帶來助益。

另外一些和平建造的計畫，在以巴有數百萬美元的投資都在這些計畫裡，例如舉辦夏令營，讓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一起參與夏令營，一起玩曲棍球、足球、管弦樂團等。很多這種計畫，我們都很喜歡這樣的計畫，感覺很棒，可以看到這兩個敵對的人一起合作。我們相信他們一起合作，他們就能停止憎恨，然而這個理論的問題是：他並沒有思考到衝突層面的政治結構！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人不是只是彼此憎恨的問題，這是跟殖民主義有關。一群猶太人他們覺得特別優越，因此有權力來奪走巴勒斯坦人的土地與資源。對於以色列人的社會而言，以巴小孩一起踢足球，並不會影響他們對於自我優越感的定義。

**John Paul Lederach** 他說轉換衝突必須發生在四個層面當中才能有效，這四個層次是：

個人層次——去改變個人怎麼看待其他人的想法。同時也去照顧到他生理跟心理的需求。假如你在政治情勢當中，你可能會受到很多創傷，所以在這樣衝突轉化中，會去關注到個人的內在。

關係的領域——我們想在不同的政黨，建立比較正面的關係，我們希望我們彼此之間有比較健康的權力關係。

結構的面向——假如是身為一個猶太人，他們不應該只是視自己為優越的人，必需要找到其他可能的關係，讓他們看到這是社會結構的問題，在法律上他們給特定族群權力，排斥其它族群。以以色列為例，有超過五十條法律給以色列人特權，變成是直接法律上歧視巴勒斯坦人。有一個問題：當我們兩個族群在管弦樂團演奏，當我們說再見，一起去很多地方演奏，互相交流再彼此道別，他回去他的社會，但這個社會給他各式各樣屬於以色列人的特權，有學校，有更多的錢，因為他是猶太人。當我去大學，我絕對可以進去，因為我有在軍隊中服役，但是在巴勒斯坦不會享有一樣的權力。所以在這些衝突的初步轉換中，我們開始了解，在個人層次上去改變無法足夠改善這樣的衝突，我們也必需在結構上做改善。

最後是文化層次——假如我們有暴力的歷史，它必需要轉化成一個非暴力的文化。猶太人傳統許多是跟社會正義有關的，事實上在世界上，許多猶太社群他們都是首先站出來抗議以色列的。越來越多的巴勒斯坦人也開始擁抱這種非暴力的方式，重要的是我們必須要對這些文化當中的非暴力開始有認同。

另一個改變的理論源自於桂格教會（基督教）。在衝突當中，當一個族群比另一個族群擁有更多權力時，一開始對於這樣衝突會比較少覺察，在這種自然而然的壓迫下，很少去覺察它。對於那些被壓迫的族群，他們就很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覺得本來就是生來被壓迫、那是我的罪孽、輪迴；對於有權力的，他們也覺得理所當然，他們就是接受，並沒有批判式的思考。假如我們要改變這樣的衝突，就得要清醒過來。弗雷勒（巴西教育家），他發明了一個名詞：喚醒意識。喚醒這個社會動力、真實的意識形態，我們醒來看到真相，我們看到誰有不公平的權力、誰是被這樣的權力壓迫、歧視，同時我們也有動機去參與行動，我們去改變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我們對事有意識，並採取行動。在第一個潛在衝突階段，去喚起他們的意識，是非常重要的任務。一人一故事劇場是可以執行非常好的功能之一，這是我們在巴勒斯坦做的一個方式，去喚醒他們的意識、鼓勵他們採取行動。當人們覺醒之後，他們會開始掙扎，他們想要在這個不平等的關係中再度取得平衡（對等）。衝突可能是用暴力或非暴力的方式處理。你們對於一個制裁性的運動了解嗎？巴勒斯坦社會告訴國際組織：你們不要再買以色列的東西。對以色列政府進行制裁，直到他們能遵守國際法，這是他們試圖去找到平衡的行動。他們看到有更多平衡出現時，另一方就有意願來進行對話。以色列人永遠不可能主動收回屯墾區，我們必須用軍事、經濟上給他們壓力，抵制運動就是其中一種非暴力方式。

一人一故事劇場中，我們與集體抵抗者非常靠近，我們邀請觀眾一起分享故事，我們也告訴觀眾回去時可以加入什麼，一起加入抵制運動。當權力被平衡時，我們開始能夠談判、進行對話，我們可以有比較持續性的和平，開始能有比較健康的權力關係。我們在巴勒斯坦所做的工作，仍然是在潛在衝突與明顯的衝突的範圍裡去進行著。但是在東歐，我們就比較用劇場形式來完成第三或第四部份，進行持續性和平的面向。對我們而言很重要的是要實事求是的去分析，當我們要去介入時，哪些面向是比較實際的。如果我們說坐下來好好談吧，事實上卻不可行，他們還在潛在衝突當中，自我意識尚未覺察。

我分享的理論是來自學術上的理論，觀察衝突情境之後，這些是巴勒斯坦的說故事者所分享的。說故事如何帶來影響力？其中一部份說故事可以教育觀眾，讓他們有自我察覺。第二點非常重要：當他們在說故事時，並不只在說出所經驗的壓迫狀況而已，他們也同樣在分享身為一個人，如何更為強壯，面對生活的處境，分享如何抵制當權者的方式，讓它成為一種方式彼此教育。「當軍隊來到家中時，你可以做出以下方式；當軍隊逮捕兒子、帶到監獄、被罰罰金時，這是我的一些忠告。」觀眾事實上正在用故事彼此教育。他們透過故事告訴彼此：我們並不只是受害者、犧牲者。「上週軍隊來把我們的房子弄垮了，但我不並不是只是被動的坐在那邊，我告訴他們：『你們沒有權力摧毀我家。』」假如有人說這樣的故事，來

跟觀眾透露這樣的訊息，他在說：「假如軍隊來摧毀你家時，不要讓他摧毀你的心靈，你要讓他們知道你的心靈是強壯的，我們能夠強壯的站在軍隊面前，大聲的大吼、用力的反抗，展示出你的內在仍然是可以強壯的！」

當這些在觀眾席裡的活動者，講故事的人裡也看到哪些人是可以給與我們互相支持。一人一故事劇場在彼此的社區之間產生連結。演出之後，他們可能會跟那些陌生人說：「我們需要你們，我們要做一場抗議，我們一起做吧。」在過程中彼此工作，產生一些關係與連結。

最後，一人一故事的治療面向：帶著一個故事，有如沈重的石頭，因此而受苦。他們對於這些政治壓迫感到極大的痛苦，當他們把故事分享出去，有一群演員認真的聽故事，並把故事具像化，突然之間，他們覺得不再孤單，因為這些演員也加入他們的生活當中。除此之外，內在的痛苦也已經被外化出去了、被具像出來了，它為說故事人帶來一些距離，讓他被賦權。這個痛苦的故事不再只是在腦中盤據著，它被搬演出來了。也有觀眾分享，當他們在分享故事時，給他們支持、陪伴的感覺。

我要準備停在這裡，假如想知道我更多的工作，你們可以寫信給我，我寫了一些這方面的文章，有些是利用一人一故事劇場進行一些政治活動，有些是用一人一故事劇場，來面對巴勒斯坦的內在創傷。所以，這是我的 mail：[benjivers@gmail.com](mailto:benjivers@gmail.com)  
歡迎來參加自由搭乘。

[Q & A時間]-----

Q：組織時間、影響面？

A：一般來說，我們希望有很多觀眾，假如我們可以改變很多人的心智的話，被激勵做更多的行動。但是我並沒有跟著這樣的想法走，觀看演出後，一些些改變有可能達成，但是真正的改變是透過建立關係而開始的。劇場比較像是打開一扇門，或是用這個來建立關係。主要是圍繞這個劇場，所發生的事能夠帶來改變。在這之前的組織工作，我們不斷回到社區當中，當社區的人邀請你去參加他們的婚喪喜慶，你會過去，藉由這樣的關係，改變於是有可能發生。

Q：我非常感動，在那樣的狀況，對抗高牆。自己是如何維持你內在的力量？

A：在我去到巴勒斯坦之前，我做了很多功課，我閱讀很多書。我期待去看到受創的人民、生氣的、受苦的、暴力的人民。當我到時，我很驚訝，他們是非常正向的人們。我之前在舊金山住了四年，都沒有遇過這樣的人，這對我而言是很重要的課題。當我們遇到壓迫時，我們有能力去做回應。我們可以讓我們的心靈、跟我們的兄弟姐妹在一起，讓正面的特質繼續維持著。對我而言，去跟這些生命的浪潮產生連結，他們就會帶給我不同的力量。

Q：在做一人一故事劇場時，通常希望自己在中立，但是你對巴勒斯坦已經有一定的立場，這是否影響到你在做一人一故事劇場，能否承載別人的故事？我觀察在台灣，某程度覺得最好不要表達你的立場，保持你的中立性。我對此感到矛盾，我們可以表達，我們也做一人一故事劇場？還是說我們做一人一故事時就應保持中立？

A：我想並沒有什麼規則吧。也許對於你而言，最好中性些。你可以在工作中探索一下。但對於巴勒斯坦的狀況，有一方已經是非常明顯的被壓迫，我們沒有辦法站在一個中立的立場，我們必須採取行動，對抗這些不公不義的事，不然我們自己也是這個問題裡的一部份，我們也是不公不義的一部份！所以，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去阻止這樣的壓迫。當某些狀況是沒有這麼強烈的壓迫，可能只是有不同的意見，也許在這樣的狀況下，中立是比較好的方式。謝謝大家。

※**Ben** 補充的文章

Rivers, B. (In press). Narrative Power: Playback Theatre as cultural resistance in Occupied Palestine. *Research in Drama Education: The Journal of Applied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Rivers, B. (In press). Cherry Theft Under Apartheid. *The Drama Review*.

※歡迎加入:**2015** 年自由巴士行動

[www.freedombus.ps](http://www.freedombus.ps)

[benjivers@gmail.com](mailto:benjivers@gmail.com)